**增长韧性、社会能力与长期增长绩效：基于学说史的考察[[1]](#footnote-1)\***

杨先明 邵素军

摘要：大规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推动了学术界重新思考抵御增长萎缩与长期增长绩效的关系。经济史表明，长期增长绩效不过是增长和萎缩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传统经济分析忽视了发展过程中增长萎缩的重要性；从长期增长的结果来看，降低萎缩率和萎缩频率与实现高增长率同样重要。本文从学说史的视角，考察了主流经济学对增长萎缩分析缺失及其原因，分析了萎缩与长期增长绩效的经验史实，讨论了增长萎缩的内涵和导致增长萎缩的原因，并从社会能力的角度探讨了增长韧性的内涵。本文认为，社会能力为国家间的增长韧性差异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解释框架；而社会能力的积累有助于增强国家的增长韧性。

关键词：增长韧性 社会能力 长期增长绩效 学说史

中图分类号：F093 JEL：B13

**Growth Resilience, Social Capability and Long-term Growth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Doctrine History**

Yang Xianming1 Shao Sujun2

(1.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2.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Abstract:** The impact of the large-scale epidemic on the global economy has pushed academic circles to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sting growth shrinkage and long-term growth performance. Economic history shows that long-term growth performance is the result of both growth and shrinkage, but traditional economic analysis ignores the importance of growth shrinkage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erms of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performance, reducing the rate and frequency of shrinkage is as important as achieving high growth r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histor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lack of analysis of growth shrinkage in mainstream economics and its reasons, analyzes the empirical history of shrinkage and long-term growth performance,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of growth shrinkage and the reasons leading to growth shrinkage, and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of growth resil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ability.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social capability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the differences in growth resilience among countrie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capability can help strengthen the country’s growth resilience.

**Keywords:** Growth Resilience; Social Capability; Long-term Growth Performance; Doctrine History

一、引言

经济赶超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长期的经济增长，任何落后国家都不可能赶上领先的发达国家；赶超的历史同时也表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往往具有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特点，不断产生的增长萎缩影响了它们缩小与领先国家之间的差距的努力效果。但是，传统的增长理论总是片面强调增长，而忽视发展经验中的一个基本事实，即增长萎缩对长期增长绩效的作用。其实，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某些增长阶段其速度并不低于发达国家，但是相比较发达国家，其增长的萎缩率和萎缩频率高于后者(Broadberry & Wallis，2017)。实证分析表明，萎缩频率比萎缩率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损害更大，萎缩频率高和萎缩率大，是导致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落后的主要原因(Andersson, 2018)。因此，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取决于抵御经济冲击的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从冲击中恢复增长的能力，即复原力。一国抵御冲击和从冲击恢复的能力二者构成了国家的增长韧性，决定了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在实现增长努力的同时，抵御增长萎缩，包括降低萎缩频率和萎缩率，提高经济增长韧性，对于一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尤其在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各国正为走出经济衰退的努力之际，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在人类历史上，大规模流行病冲击一直是增长萎缩的基本原因之一，其产生的重大社会经济效应长期为学术界所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从中世纪开始到2009年，对人类社会造成重大灾难的大规模流行病共15次，均产生了增长萎缩的严重后果。大规模流行病首先减少了大量人口，并深刻影响人类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关系。Jordà et al (2020)从全球视角分析了历来重大流行病对欧洲国家造成的宏观经济影响，发现每次大规模流行病以后，欧洲的实际自然利率持续下降几十年之久，40年后实际自然利率才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同时，由于劳动力供给的急剧减少，随之实际工资开始上升；在大规模流行病发生40年后，实际工资上涨10%左右[[2]](#footnote-2)。Barro et al (2020)用1918-1920年流感死亡的年度信息进行的回归表明，大流感使这48个国家的人均实际GDP减少了6.2%，各国平均消费减少了8%甚至更多。大规模流行病，无疑严重冲击了各国经济增长；人口和劳动力的大量减少，导致相对要素价格和部门贸易条件的急剧变化，也改变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人口与土地、资本与劳动的比率、投资与储蓄比率等主要变量的关系[[3]](#footnote-3)。相关研究进一步发现，各国实际自然利率对疫情反应存在较大差异[[4]](#footnote-4)，各国人口恢复到原来水平所需时间各国差距也十分突出[[5]](#footnote-5)，在疫情结束后经济增长复原力方面差异也十分明显。一些国家经济较快回到长期增长轨道上来，而另外一些国家则不然。当下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不仅使各经济体面临经济萎缩的挑战，而且对各国抵御大规模流行病冲击并复原增长的能力也是一次重大考验。

大规模流行病对增长过程的冲击效应，为研究增长萎缩与长期增长韧性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可供经验分析的历史案例。人们从中至少可以观察到疫情冲击导致的不同萎缩强度、时间跨度、萎缩频率对长期增长绩效产生的影响。同时，“国家特定的特点”[[6]](#footnote-6)使不同经济体从增长萎缩到经济复原、然后回归增长的轨迹并不相同。应当指出，疫情导致的萎缩，只是冲击影响长期增长绩效一种形态，自然灾害、战争与动乱、制度变革、人口变化和产业变迁等，同样可能导致经济萎缩。事实上，由不同因素引致的萎缩与经济增长，在人类社会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一直在交替发生。但是，二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动态究竟如何作用于不同国家从长期停滞向增长转型，在经济史或理论层面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根据历史数据的分析，短期增长率并不是支持长期经济绩效改进的唯一力量，萎缩的减少同样构成长期增长绩效改善的主要因素。而且，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短期增长率在一直不断趋低，如果仅从增长角度显然不足以解释长期增长绩效一直动态向上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增长的启动和增长过程的维持是不一样的[[7]](#footnote-7)，在增长过程经济萎缩是一不可忽略的变量。因此，要解释长期的经济表现，就需要一个既包含萎缩又包含增长的理论。

从经济增长思想的发展看，对增长萎缩的研究显然不可或缺。毫无疑问，增长一直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向上。没有长期的经济增长，国家之间的赶超不可能得到解释，因此对经济增长的研究肯定要多于对经济萎缩的研究[[8]](#footnote-8)，而且对此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增长与发展。但与此同时，如果忽视经济萎缩在长期增长中的作用，对经济史的理解是不完整的，在理论逻辑方面也存在明显的缺陷。这正如斯蒂格利茨(Stiglitz, 2005)所言，增长可能是一切，但如果要了解经济发展的过程，它并不是唯一的事情[[9]](#footnote-9)。同时，比较世界增长历史后就可以发现，实现增长趋同的经济体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在扩大，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较高增长萎缩率和频率抵消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努力[[10]](#footnote-10)。换言之，对长期增长研究而言，必须包含对萎缩的机理和效应的分析，否则难以理解国家的增长分化现象。长期以来，主流增长理论以如何实现增长为目标，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萎缩作为变量包含在其中；而要回答国家间长期增长差异，需要人们把萎缩放到与增长至少同等重要的地位，即从经济史揭示增长萎缩效应经验事实，并从新理论角度论证其中的机理。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遭遇百年不遇的重大疫情冲击之际，如何避免负增长置身于经济萎缩之外，尽可能在短期内走出增长萎缩陷阱，成为各国出于利益关切所在。关注经济萎缩对长期增长的冲击与危害，分析各国抵御萎缩实现经济恢复增长背后的决定因素，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从学说史的角度，考察了增长萎缩的史实及其产生的理论后果，以及学术界对增长萎缩原因的一些观点，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在抵御增长萎缩的因素分析中嵌入社会能力的理论价值，并进一步从社会能力的结构变量角度来思考关于增长韧性决定因素的合理性。并且本文力图表达这一观点，即不断减少或降低制约增长的负面因素，增强经济增长韧性，同样是决定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增长萎缩：长期增长分析的缺失环节

罗斯托在其《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一书中表示，如何处理经济增长的极限，看待经济系统的趋势，加速、减速、处于稳态或者走向衰退，何为其决定变量以及时间因素在其中的意义等，是所有增长模型都需要深究的问题。这意味着经济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实现增长问题，而且也要关注增长逆转及其机理问题，它们同样属于增长理论要研究的范畴。但尽管如此，无论是罗斯托本人、还是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增长萎缩及其效应一直是在长期增长的分析中被忽视的问题。

应当指出，尽管增长萎缩与增长停滞二者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并非是内涵一致的概念，其统计学意义也不尽相同。增长停滞一般指的是经济扩张受到限制，增长潜力丧失，增长最终趋于平稳(Robbins, 1930)的结果[[11]](#footnote-11)。不同于增长停滞，增长萎缩是指经济出现的负增长现象，萎缩率就是经济的负增长率，萎缩频率则是指一段时期内负增长时期所占的比率，即1-增长频率。Broadberry & Wallis(2017)把增长萎缩定义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连续出现(如三年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连续的显著负增长、或者显著正增长，这两种状况出现的时间长短与频率(次数)，自然会对国家间长期平均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产生严重的影响[[12]](#footnote-12)。换言之，增长率、萎缩率及其频率，是决定长期增长绩效且作用相反的两种力量。应当看到，把经济萎缩作为变量嵌入到长期过程、考察其对长期增长趋势的持续影响，是我们理解增长萎缩效应理论与一般增长理论二者之间区别的关键：前者从增长与萎缩对长期的平均效应着眼，把增长与萎缩的强度、频率视为研究长期增长绩效的关键变量；后者则主要考察人口、资本与技术、人力资本与人均收入内生演化的发展过程，增长要素及其作用机制是其分析的重点[[13]](#footnote-13)。为了观察萎缩与增长交替以及影响程度对国家兴衰的影响，Broadberry & Wallis(2017)研究中的“长期”，以50年或者更长年代为时间单位[[14]](#footnote-14)；而一般增长理论的“长期”概念实质上则把“萎缩”变量的作用排除在外，以便于在更短的期间内考察增长的波动[[15]](#footnote-15)。

以古典经济学家为例。亚当•斯密把社会划分为三种状态：进步、停滞和衰退，认为美洲殖民地处于进步状态，相对富裕的中国处于静止状态，而孟加拉国则处于衰退状态。虽然亚当•斯密看到了经济停滞和衰退，并试图对停滞和衰退的分析来证明“自然自由制度”的重要性，但如何通过资本积累和生产性劳动增进国民财富，才是斯密关心的核心问题。斯密认为，增长随着资本积累、市场和分工的扩大而发生，反之，停滞则会出现(Smith，1776)。持续的负增长(萎缩)对国民财富长期积累会生产什么样的后果，亚当•斯密并没有关注。大卫•李嘉图则认为，当资本积累引致较高的市场工资而使人口增长较快时，农业的耕作边际不断向生产力低的土地资源推进。在一个国家的土地等自然资源禀赋固定的条件下，人口的增长会导致食物价格的上升、工资成本随之上升，因而利润率会下降，从而无法为追加投资提供有效的激励，此时经济增长会走向停滞，即存在“李嘉图陷阱”，这是被后人称之为“经由人口和报酬递减律走向停滞的经济增长理论”[[16]](#footnote-16)。显然，这里的停滞，是指经济处于静止均衡状态，而持续的负增长——萎缩对长期增长的影响同样不在他研究框架内。其实，以“李嘉图陷阱”的长期效应推论英国当时的《谷物法》的不适当性，才是李嘉图对经济停滞问题论证的本意。

与李嘉图事实上“并不关心长期的经济增长”不同[[17]](#footnote-17)，马尔萨斯认为人口与资本的动态均衡增长的推进总归要达到其极限，这时整个经济增长便进入静止局面。由于人口增长导致可耕作的土地供应减少，工资增长停滞产生抑制人口生产的后果，进而相对人均工资不得不提升，导致增长和停滞现象交替出现。换言之，在任何农业技术进步只会导致人口增长的情况下，规模报酬递减将长期抑制人均收入的提高，这一状态被称之为“马尔萨斯陷阱”或“马尔萨斯均衡”。很明显，马尔萨斯更多关心的是增长停滞现象及其根源问题，增长萎缩、尤其是萎缩率和萎缩频率，及其对长期平均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影响，同样不是马尔萨斯关注的要点。

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凯恩斯从经济周期角度探讨了经济衰退、萧条和危机的成因问题。他认为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纯粹的市场机制无法解决这一难题，为保经济可持续运行，政府必须要进行干预。凯恩斯之前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相信市场经济自动均衡机制，以后在“就长期而言我们都死了”理念下放弃长期均衡分析，转向关注非均衡常态下的短期宏观稳定问题。熊彼特也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分析了萧条现象，认为经济萧条并不可怕，它是“再吸收与清理的正常过程”[[18]](#footnote-18)，特别是随着创新“被消化”，萧条也会走到“一个新的均衡点”，并“兑现繁荣的承诺——成本与价格的长期下降”[[19]](#footnote-19)。可见，他们研究并不涉及持续负增长如何影响长期增长绩效问题。

迄今为止主流的增长理论对发展进程的“大多数分析都集中在提高增长率上”，很少关注持续的负增长对长期平均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效应问题，甚至对经济停滞的问题也较少讨论。由于“稳定的均衡已经被剔除出局”，经济增长理论本质上“体现动态均衡的概念”[[20]](#footnote-20)，从而不可能深入到经济萎缩对长期增长绩效的作用问题。毋庸置疑，增长理论的出发点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从哈罗德—多马模型到索洛等人构建均衡增长路径，刻画了分别以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为中心的不同生产函数，强调了不同发展阶段下的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的作用。罗默等人在此基础上利用知识等具有外部性属性生产要素，构建了可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总体生产函数，以内生增长模型进一步解释了实现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内在机理，突破了传统均衡分析从规模报酬不变到规模报酬递增的逻辑困境[[21]](#footnote-21)。显然，在以生产函数为框架的主流增长理论，其重点分析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作为推动经济动态向上的机制。长期增长有可能更多取决于萎缩速度和频率的降低、而不仅仅依靠增长率上升，主流增长理论并没有对这一的经验事实做出理论解释[[22]](#footnote-22)。

此外，二战后出现了以罗斯托等为代表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以一定标准将人类社会或工业化发展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罗斯托十分关注新产业复合体的周期性出现、迅速扩张以及逐渐衰退的过程，认为经济增长之所以停滞，主要原因在于旧的主导产业丧失了其作为主导部门的能力，而新主导部门仍在发展当中。罗斯托对增长阶段的划分，并未排除经济增长在长期中陷入持久停滞的可能[[23]](#footnote-23)，但总体而言，罗斯托等人仍然把经济增长视为一个简单的线性化过程；在这一背景下增长萎缩不可能被作为一个长期增长过程的“重要变量”进行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经济理论相比较，制度经济学研究较多涉及增长衰落问题，其内涵与增长萎缩较为接近。诺斯(North, 1981)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明确提出，衰落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们是由制度或组织的失败所引致的；衰落会产生技术进步、组织变革和经济增长断裂的可怕后果。[[24]](#footnote-24)而Acemoglu et al (2002)进行的跨世纪的经济史研究，重点分析了历史上发生的财富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现象，强调了制度是产生财富逆转的基本因素[[25]](#footnote-25)。总之，制度经济学认为，各国的发展差异根源于制度差异，增长衰退只是制度抑制了增长的后果。因此，在制度经济学框架下，增长衰退不过是“制度最重要”命题的说辞之一，其核心在于强调制度对增长的基础作用，制度要素成为长期增长绩效的核心解释变量。另外，在盖勒(2017)的统一增长理论中，千年经济史分被划为长期停滞的马尔萨斯时代、人均产出开始起飞的后马尔萨斯时期，以及实现了持续增长的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他认为“从停滞时代向经济持续增长阶段的转型，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副产品”[[26]](#footnote-26)；而人口规模、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经济发展阶段更替的动力机制。但是，盖勒(2017)不是把增长与萎缩作为对应的一组变量、并从二者力量交互消长关系分析长期停滞形成的原因；抑制萎缩在不同国家从停滞转向增长中产生的作用，在统一增长理论并没有得到分析和解释。

在长期增长研究领域，对增长萎缩分析缺失有其原因。从历史来看，经济快速增长是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步实现的，根据Maddison(1991)估计，过去的1000年，年均增长率只有1/19个百分点，从1820年开始年均增长率上升到1/2个百分点，20世纪下半叶年均增长率超过了2%[[27]](#footnote-27)。古典经济学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刚刚形成和发展壮大的时期，因而斯密等所关注的是如何为市场经济提供理论基础，以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同时对于以“看不见的手”为信条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说，即使有增长萎缩也属于正常现象，市场机制迟早会驱动经济走向均衡。而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经济周期理论，虽然详细分析了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但认为衰退不过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经济衰退和萧条，只是经济周期的正常组成部分，正如熊彼特所言：“衰退的唯一原因是繁荣——这意味着衰退只不过是经济体系对于繁荣的反响，或者是对于繁荣所带给这个体系的新情况的适应，这样，对衰退的解释也就根源于对繁荣的解释”[[28]](#footnote-28)。在这样的背景下，增长萎缩——持续负增长对长期增长绩效的效应，不可能成为主流经济分析的重点。即便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研究，增长萎缩问题同样受到忽视。根据Andersson(2018)统计分析，二战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研究的大量文献中，增长萎缩只引起了极少的关注[[29]](#footnote-29)。

但是，如果要探究哪些因素决定了长期增长绩效，经济又是如何走出长期停滞，那么增长萎缩及其作用就应当成为要正视的问题。为什么增长率不同和为什么长期增长绩效不同，这是并不一致的两个问题。要充分理解长期增长绩效的形成机制，就必须充分了解增长萎缩。如同刘易斯所总结的，“在漫长的增长过程中，存在很多陷阱，任何一个国家，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其中……虽然知之甚少，但是我们过去四千年的经济史却似乎相当有力地支持了这样一种预期，即长期增长之后，缓慢增长、停滞，甚至衰退就会在适当的时候接踵而至。”[[30]](#footnote-30)经济增长过程是非线性的，但要全面理解这一过程并非易事。

三、经验史实：增长、萎缩与长期增长绩效

从国际经济增长史来看，实现偶尔的快速增长，甚至维持短期的高增长率并不困难，历史上几乎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但长期保持持续的增长率，则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才实现过。Broadberry & Wallis(2017)充分利用众多的国际数据库，对各国增长、萎缩和长期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历史分析。其研究表明，长期增长绩效的改善源自于萎缩频率和萎缩率的下降，而非增长率的增加，发达国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抑制经济萎缩所导致的增长逆转。当然，他们并没有否认短期增长的重要作用，指出长期增长绩效需要持续的短期正增长，短期增长率持续或者提高，有助于长期增长绩效的改进。Broadberry & Wallis(2017)强调的重点是，经济萎缩是大多数增长过程中的客观存在，构成了长期增长绩效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但是在相关研究中其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基于这一认识，他们认为长期增长绩效应当是增长频率、增长率、萎缩频率和萎缩率的组合，即长期增长绩效不过是增长和萎缩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构建的长期增长绩效的方程是：

*g={f(+)g(+)}+{f(-)g(-)}*

其中*g*为经济增长绩效，*f(+)*为经济增长频率，*g(+)*为经济增长率，*f(-)*为经济萎缩频率，*g(-)*为经济萎缩率。由于增长频率等于1减去萎缩频率，上述方程式可以改写为：

*g={1- f(-)g(-)}+{f(-)g(-)}*

即：长期经济绩效取决于萎缩率和萎缩频率。

Broadberry & Wallis(2017)在这一方程基础上，利用数据分析了由近至远三个历史阶段的增长史实，进一步论证了上述结论。

其一，富国增长的频率高，而穷国萎缩的频率多。对1950-2011年期间141个国家长期增长绩效的分析发现，富国在大约84%的年份里实现了增长，而穷国仅在62%的年份里实现了增长。虽然穷国在增长期的增长速度并不低于富国，“事实上，穷国的平均增长率要高于富国”[[31]](#footnote-31)，但它们的萎缩率和萎缩频率也更高，其累积结果仍然是穷国不断拉大了与富国的差距，导致穷国与富国出现了无条件的趋异而不是趋同。因此，从长期来看，穷国与富国缺乏趋同性的主要原因在于：穷国与富国的萎缩程度不同，富国不仅萎缩时间越来越短，而且萎缩率也越来越低。

其二，长期增长绩效的改善不仅取决于增长频率提高，也取决于萎缩频率的降低。这是对1820-2008年期间14个欧洲国家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4国的长期增长绩效的分析后得出的结论。研究发现，自1950年以来，这18个国家的增长频率都急剧增加，相应的萎缩频率急剧下降，从之前的约1/3下降到1/8。因此，这18个国家1950年以来增长绩效的改善，主要归因于萎缩次数的减少。在此期间，大多数国家增长率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实际上略有下降，但萎缩率和萎缩频率下降的幅度更大，于是这18个国家1950年以来的长期增长绩效反而有所改善。

其三，萎缩频率、增长逆转导致国家之间竞争优势发生根本改变。Broadberry & Wallis (2017)对1270-1870年期间英国、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四国的增长情况分析发现，在此期间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实现增长繁荣之后通常会出现增长逆转，正负增长明显交替相互冲抵；其结果是这一时期两国的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变化。而英国和荷兰尽管在18世纪之前存在正负增长交替的时期，但从长期来看人均收入有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随着18世纪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萎缩导致的增长逆转逐步减少。因此，随着负增长不断减少和萎缩程度持续下降，英国和荷兰人均收入最终超过意大利和西班牙，逐步成为世界强国。

与Broadberry & Wallis(2017)分析的国家群体不同，Andersson(2018)在吸收Broadberry & Wallis(2017)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萎缩与长期增长绩效的关系。在其改进的方程中，长期经济绩效(*EP*)包括增长贡献和萎缩贡献的净效应，增长的贡献是经济增长频率*f(g)*和规模*m(g)*的乘积，萎缩的贡献等于经济萎缩频率*f(s)*乘以规模*m(s)*。即：

*EP*=*f(g)m(g)+f(s)m(s)*

由于*f(g)+f(s)*等于1，所以方程可以简化为三个自变量

*EP*=*[1-f(s)]m(g)+f(s)m(s)*

基于这一方程，Andersson(2018)采用反事实的分析方法，对比分析了1951-2016年期间20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10个拉丁美洲国家和17个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结果发现这些国家的增长率相对一致，而萎缩率和萎缩频率则差别很大。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萎缩频率为34%，拉丁美洲为25%，亚洲为15%。相比之下，亚洲一直在稳步减少增长萎缩的影响：“亚洲更好的长期增长绩效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增长能力的提升，而是应对萎缩能力的增强”[[32]](#footnote-32)。Andersson(2018)的反事实研究表明，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如果保持其真实的增长率，但萎缩率和萎缩频率与亚洲一致，那么撒哈拉以南非洲今天的人均收入将比实际水平高出大约3倍。由此他认为，已有的发展研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多数发展中国家实际上都有过偶尔的高增长期，但它们缺乏从相对频繁的萎缩中实现复原的能力”[[33]](#footnote-33)，发展中国家并不是缺乏增长，而是它们频繁的萎缩导致了增长的不可持续。虽然反事实分析只提供一种模拟推论，但其研究清楚地表明：对萎缩的抵御和从衰退中复原能力，是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绩效的关键变量。

其实，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增长分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增长分化的原因，学术界一直有所所关注。刘易斯较早就指出，“即使是有节奏的增长也可能会终止……在经济出现强有力的增长之后会出现停滞和下降，甚至下降到一无所剩的地步。增长之后可能呈现停滞，正像停滞之后可能出现增长一样”[[34]](#footnote-34)。不过，萎缩与长期增长绩效关系的历史轨迹，并非只是对历史数据的重新整理和统计分析，更重要的是，从这被忽略的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史实中，可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与教训，这对长期增长过程分析是必须弥补的重要环节。罗德里克(2016)也从发展比较的角度，强调了研究国家间增长分化现实意义。他指出，工业革命以来世界部分经济体如西欧、美国、日本等实现了经济起飞，而世界其他地区增长却十分缓慢，世界经济增长的总体印象掩盖了全球增长绩效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巨大差异：“有的国家增长很快，有的国家增长很慢；有的国家一直快速增长，有的国家只快速增长了10年或者20年；有的国家在1980年左右出现经济腾飞，有的国家却在1980年前后经济开始崩溃。”[[35]](#footnote-35)在1996-2004年的40多年间，发展中国家人均实际收入年均增长2.1%，而富裕的发达国家在1996-2000年间则达到了2.7%，只有为数不多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持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显然，增长趋同并非是一规律性现象[[36]](#footnote-36)。Easterly et al(1993)使用1950年后时期的数据分析后指出，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主要区别不是穷国在增长时比富国增长慢，而是在较少的年份内增长、在较多的年份出现负增长，即“增长逆转”[[37]](#footnote-37)。从这个角度看，实现发展的关键在于减少短期增长率的可变性，而不是仅仅改变短期增长率。因此，增长与萎缩之间强度和频率的差异导致了国家之间的增长分化。

疫情等危机冲击直接引致增长萎缩的发生、并产生短期或长期效应。其实，无论是外部冲击还是内部冲击，都会改变人均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存量，改变相关经济体的收入稳态水平。根据Raddatz(2007)的研究，外部冲击解释了低收入国家发展差异的11%，剩下的89%是内部冲击造成的；与外部冲击相比，内部冲击才是影响增长萎缩的根本因素。Cerra & Saxena(2008)通过对190个国家的分析表明，危机冲击会带来永久的长期经济成本。此外，一些研究还表明，频繁的危机冲击导致的增长萎缩，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严重的发展陷阱的根源之一。20世纪80年代危机期间的增长萎缩，使拉丁美洲失去了十年以上的时间(Besedes & Blyde, 2010)。不过，疫情、金融危机、战争等危机冲击与结构变化结合在一起，对增长萎缩、或抑制萎缩产生了更为深远和复杂影响，人口变动、产业变化和技术进步是深化或抑制萎缩的主要因素。

人口变化的影响。在整个发展过程，没有什么因素比大规模流行病对人口增长的短期冲击更大，但其效应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的前提条件。研究表明，在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之前，疫情导致的短期死亡率上升产生了劳动力减少、随之而来人均收入增长和生育率的恢复等持续反应，甚至出现增长的逆转。生活水平对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反馈作用具有明显的短期特征，这一效应显然符合典型的马尔萨斯均衡，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答案。一些研究认为，疫情冲击产生的人口下降，更可能发生的状态是稀释了人口密度，降低了社会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获得收益的可能性，从而破坏商业网络并导致经济出现萎缩。显然，这是按亚当•斯密理论对人口变化效应的一种解释。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如意大利反复停滞的历史，印证马尔萨斯均衡的存在。而西班牙的人口变化产生的增长逆转，似乎用亚当•斯密的框架更具有说服力[[38]](#footnote-38)。此外，相关分析认为，尽管人口趋势类似，但英国和荷兰在现代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就已经摆脱了马尔萨斯均衡的束缚。人口变化究竟如何影响增长萎缩与恢复？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至今仍有必要去清晰地揭示其内在机理[[39]](#footnote-39)。

产业结构的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一直支配着萎缩与增长，并凸显各部门内增长和萎缩变化对长期增长绩效的相对重要性。从长期停滞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之前，农业作为主导产业对增长与萎缩的关系密切，这方面英国最为典型。由于与天气有关的冲击经常导致收成剧减，农业产量的短期波动通常非常大，英国在1270至1870年的漫长岁月中，农业经常出现10％或20％的下降，而农业萎缩频率(次数)则更为惊人，高达50%。持续的农业衰退抑制了人口增长，从而成为引发经济萎缩重要因素[[40]](#footnote-40)。随着向现代经济增长阶段逼近，农业在总体经济活动中所占份额开始下降，农业变化趋势可能对增长与萎缩交替的作用的重要性相对弱化，而工业和服务业在其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产业结构变化成为减少增长萎缩的一个主要因素。英国是较早成功实现结构转型的国家，其长期经济绩效改善与部门自身的增长与萎缩的紧密相关。农业增长对长期增长绩效贡献在下降，同时其萎缩产生的效应也在变弱。依此相反，服务业增长与萎缩对长期增长绩效的正负效应均在增强。而工业则不仅维持了增长率、且萎缩率也会不断降低[[41]](#footnote-41)，成为对长期增长绩效产生正效应的唯一部门。这表明，在减少总量萎缩方面，每个部门(包括农业)内部增长和萎缩贡献十分重要，工业部门的特征，使其成为英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扶梯”。

技术变化的影响。就理论而言，随着经济从技术停滞转向技术进步，增长率和增长频率都应该增加，经济萎缩可能消失，但是经验史实往往与经济理论并不一致，而发展阶段转折是其中重要的变数。研究发现，在产业革命之前，技术进步率增长变动急剧，荷兰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时期是1540-1620，年增长率为0.64％，呈正增长。随后在1620年至166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增长，此后几乎都是负增长。在整个1540-1800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均没有增长的趋势[[42]](#footnote-42)。可见，历史上的技术进步与人均GDP一样，都可能发生增长逆转。19世纪末之前的技术进步增幅都很小，其不足以产生其对萎缩率和萎缩频率下降的抵御作用。但从长期看，技术的逐步发展也蕴含了一种动力机制。盖勒(2017)认为，技术进步带动了人口实现缓慢增长，而技术进步的加速及其对人力资本需求，以及对人口增长率下降产生的影响，构成经济从停滞向增长转型的关键动力[[43]](#footnote-43)。因此，要实现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过渡，技术进步就成为结束萎缩、走出长期停滞的重要先决条件。

Broadberry & Wallis(2017)进一步认为，尽管上述的产业结构变化、技术变化和人口变化是抑制增长萎缩的主要原因，但是制度变革才是减少增长萎缩的终极原因。这里所指的制度变革，即从一个基于身份规则体系的经济过渡一个非身份规则的社会秩序，因为在一个依附于身份行事的社会里，分工、专业化和市场范围必然受到压制，不可能内生出抑制增长萎缩的潜在机制。但有的学者明确指出，Broadberry & Wallis(2017)制度变革的观点的注意力维度太泛，时间周期太长，导致在分析上很难将制度变革与减少萎缩直接联系起来，因此需要把制度变革结合特定的发展阶段来考察，才能显示了哪些制度对抑制萎缩是重要的[[44]](#footnote-44)。因此，研究的重心也应当转到现代国家抵御增长萎缩差异的成因方面。

不过笔者认为，上述分析对认识增长过程仍然蕴意深刻。它表明所有的国家其实都存在增长潜力，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在看，增长却经常为萎缩所抵消，这一直是制约人均收入持续向上、实现增长潜力的障碍。而西方工业化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历史性差距，以及目前东亚新兴经济体与其他发展中地区之间的差距，其实都在揭示一个基本事实：抑制或抵御经济萎缩的能力，对维持国家长期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增长韧性的关键性作用，必然在增长过程中凸显出来。

四、增长韧性基础：从制度关键到社会能力

抵御萎缩并从冲击中复原增长，体现的是经济体内在的增长韧性。所谓增长韧性，是指一国经济抵御冲击、恢复增长或达到新的可能平衡的能力(Martin, 2010; Giannakis & Bruggeman, 2017)，是一国经济应对冲击的抵御力和复原力的结合。增长的历史表明，一些国家由于冲击而陷入经济萎缩，而一些国家则不仅成功抵御了冲击，且较快回归到增长的轨迹，实现了增长的持续性；而增长韧性的国家差异，导致国家间的长期增长出现非收敛状态。然而，增长萎缩与增长韧性的决定因素不尽相同，增长萎缩的成因与短期冲击的性质相关。Easterly et al (1993) 分析了1960-1969年、1970-1979年和1980-1988年三个期间115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发现贸易方面的冲击可以解释了增长率的大部分差异，增长率变化大部分可由随机冲击进行解释；而增长韧性则与国家特征相关[[45]](#footnote-45)。显然，要理解为什么国家之间增长韧性的差异，必须追溯那些基础性的本质根源，从而制度因素成为经济学家研究持续增长基础关注的重点。

聚焦到制度对长期增长的作用，刘易斯认为好制度的重要的特点在于能够创造经济机会，以便促进增长，“制度就要适应形势，以便保护积极性和促进贸易。反之，如果机会减少，增长也会下降，制度便开始朝着停滞方向调整”[[46]](#footnote-46)。罗德里克(1999)对比了1975年前后各国的经济增长，发现潜在社会冲突或冲突管理制度改变了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并解释了增长崩溃和增长逆转背后的制度原因[[47]](#footnote-47)。Jerzmanowski(2006)则认为，国家在稳定增长、停滞、危机、奇迹般的增长四种增长机制之间过渡的概率，大体上是由制度质量所决定的；而Bluhm et al (2016)强调了制度因素在增长下降期和恢复期的发生率背后的作用；概言之，制度及其变迁决定了增长韧性差异。Broadberry & Wallis(2017)指出“增长萎缩的减少是随着制度变迁而发生的”；历史上欧洲主要国家受鼠疫疫情冲击后的增长或萎缩交替时间的长短，所反映的不过是制度变革差异的后果。但是，制度变迁作为增长萎缩终极原因的结论一直遭遇了部分学者的质疑。作为发展经济学家，伊斯特利(2005)始终强调“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对贫困国家有所帮助，但本身并非一味仙丹妙药”。Putterman(2013)反对制度在“没有补充因素的情况下就导致任何国家的强劲经济增长”的说辞，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家尽管已改变其经济体制，但它们仍远远落后于东亚主要国家。对此，伊斯特利(2005)认为尽管制度变革主张强调激励的作用，但是激励在很多时候很难得到准确的衡量；在现实中，同样的政策往往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效果[[48]](#footnote-48)。因此，制度作为决定长期增长的更基本因素，还要取决于对制度的定义、质量与结构。

不同于“制度最重要”的框架，社会能力理论为增长韧性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的分析。一般认为，社会能力源于格申克龙(Gerschenkron, 1962)对后起国家工业化的先决条件的追问，而一些学者强调国家特征对发展过程的影响，其实也触及到社会能力理论的核心问题，即“国家特征”[[49]](#footnote-49)，折射出的就是“社会特质”[[50]](#footnote-50)，即社会能力。Abramovitz(1986)较早阐述了“社会能力”的概念、并将它作为“增长趋同”的限定条件[[51]](#footnote-51)。社会能力理论认为，当一个国家“技术落后但具备社会能力”时，其快速增长的潜力是强大的，即那些“社会能力已充分发展到允许成功利用技术领导者已经使用的技术”的国家，追赶潜力最大。Abramovitz(1995)认为，社会能力与“利用现代技术的能力”以及“人们的基本社会态度和政治制度”有关，教育、企业组织、金融与市场结构、社会诚信、政府稳定性与执行力等因素，是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坚韧的社会特质”的基础，其具有累积性和异质性的特征。Putterman(2013)进一步指出，历史地看，社会能力“不是简单的连续性，而是表现为一种更高的追赶能力” [[52]](#footnote-52)。应当指出，Abramovitz(1986, 1995)没有严格区分社会能力本身(国家的社会特质)和社会能力的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刻画社会能力体现形态(如信任、稳定和企业家精神等)与社会能力的决定因素(如教育、金融组织和企业等)之间联系与差别，其实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别，正如生产力与生产力决定因素不同，生产力要通过效率等才能体现一样。概言之，社会能力其实就是由各种显性因素投入或演变累积形成的国家社会特征。在一个国家长期发展过程中，一些因素有可能导致增长的波动，但随着波动的结束不再成为支配性因素；另外一些因素则沉积下来，成为制约着发展的长期趋势的本质性因素，并构成对制度激励作出有效反应的能力。社会能力正是约束着增长起伏、影响结构变化方向的国家层面的社会特定特征。

社会能力如何作用于增长韧性？ Andersson & Palacio (2017)的贡献在于建立了社会能力与抵御萎缩与增长复原之间的逻辑关联。他们肯定Abramovitz(1986, 1995)的社会能力的理论价值，对存在的难题即“未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确定和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能力”，提出了聚焦关键要素、建立经验性框架的思路[[53]](#footnote-53)。其核心思想就是“经济发展的成功似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萎缩的恢复力”；由此关键要素是那些决定国家经济赶超、并“与萎缩的复原力有直接和动态的关系”[[54]](#footnote-54)结构性变量。在此基础上，Andersson(2018)与其他北欧学者(Andersson & Palacio, 2017; Andersson & Andersson, 2019)一起构建了对增长韧性的社会能力分析框架，其特点如下：在经验事实方面，强调增长萎缩的复原力大大增加了追赶的持续可能性的事实特征；在研究方法上，将社会能力的概念作为出发点，并将其发展为一个允许实证检验的分析框架；在理论上，将社会能力分解为与经济萎缩直接相关结构变量来理解社会能力的本质，并论证了“一个国家的社会能力决定了其抵御经济萎缩的能力水平”的核心观点。显然，这些学者试图开辟社会能力与增长韧性相关性的研究议程，加深对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经济追赶进程的理解，尤其强调在理解经济增长时应考虑到经济萎缩的作用，从而可较全面深入理解增长追赶的过程。但是，社会能力究竟如何作用于抵御萎缩？这取决于决定增长韧性转型、包容、自治和问责等结构变量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方向。

转型。转型意味着经济低生产率活动向高生产率活动转移，利用现代技术在短期内提高生产率，并在长期内重新调整经济结构，其中农业转型是结构转变迁的核心；农业生产力提高增加了来自社会最广泛成员的收入和需求，使劳动力和资本分配给非农业活动。同时，转型使一个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过程。Hausmann et al (2013)认为复杂性是一个经济体所包含的生产性知识的数量，而经济复杂性与持续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一个更加多样化并在其产出基础上利用更高水平知识的经济体，更容易将资源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而避免特定冲击的后果，同时，一个能够生产和出口大量高度多样化和复杂的商品和服务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减少萎缩的程度”[[55]](#footnote-55)，由此，增长的复原力也会增强。

包容。包容强调以前被排除生产体系之外的人能够获得生产资源，人们获得更多经济机会的可能性；参与性意味着对生产性资源的广泛获取和利用，以及经济的对外开放。广泛的经济参与，是一个更有活力和多样化的社会的特征，也是包容的基本前提。包容性提供了一个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国内市场，减少了供应方面的瓶颈，而且也降低了国内价格的波动的冲击；包容性弱的经济体增长周期相对缩短(Ostry, 2015; Berg & Ostry, 2017)。Pritchett & Werker(2012)强调，包容与生产能力扩展有着根本的联系，包容增长更有可能持续，更不易受到经济萎缩的影响。因此，包容性的社会以更多的机会开发个人的潜力，增强社会活力以抵消萎缩对增长的冲击。

自治。按照Andersson(2018)的分析，自治是指政府能够在不受既得利益的束缚情况下保持与社会有效关联起来的能力，以推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实现。自治意味着政府对周围社会的耦合和约束，也确保了对投资者或特殊利益集团的可信承诺，自治的重要方式是通过政府和有组织公民之间的“收入分配谈判”，为协商一致提供了机会(Brautigam, 2008)。基于国家能力是税收的一个函数的假设，自治的核心就是发展政府的财政能力(Besley & Persson, 2013；Fukuyama, 2013)，这样保证了国家在执行政策时具有较大的财务自由(Fukuyama, 2013；Besley & Persson, 2013)。总之，自治意味着政府自主促进总体增长，从而产生有效抵御萎缩的效果。

问责。问责的功能在于保证政府治理质量及其提供公共产品的实现程度(Besley & Persson, 2013)，其核心就是要确保政府对民众征税的合法性。具体来说，问责制就是监督政府社会支出和社会补贴占GDP或政府总支出比率、以及政府开支方向。例如，支出是否有利于国家“集体”能力的提升、确保政府对教育和卫生的投资重点。Andersson(2018)相信，那些社会支出不跟随经济活动波动而变化、并实现承诺使其预算履行社会契约的国家，从长远看会具有更好的增长赶超机会。由此，问责制是促进政府合理使用税收收入的有效手段，是保证民众赋税意愿或政府扩大增税空间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社会公众对政府财政进行问责，自然也限制了政府的行政权力的扩张(Ricciuti et al, 2019)。

此外，Andersson(2018)认为，社会稳定与增长韧性的关系密切。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通过制度安排处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冲突。社会冲突会威慑投资，而投资下降通常造成增长萎缩的后果。显然，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中，经济萎缩的倾向可能更高，此时 “治理能力被用来解决冲突，而不是促进有效的发展”[[56]](#footnote-56)。因此，政府对社会冲突的有效管理，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抵御增长萎缩的社会基础。

Andersson(2018)对依托社会能力框架解释增长韧性充满信心，其理论自信来自于三方面：一是在批评Broadberry & Wallis(2017)终极制度决定萎缩论的同时，批判性地引进Abramovitz(1986, 1995)的社会能力理论并选择结构变量，其分析框架试图以社会基础为基础打通社会能力与增长韧性之间的关系；二是对制度与社会能力作了两分法，认为作为有效制度基石的客观规则，只能够解释西方经济萎缩减少的根本原因；而社会能力可视为发展中国家抵御经济萎缩的关键决定因素；三是依据“合理的时间框架内”选择社会能力的结构变量。社会能力的累积和动态演变性质，意味着社会能力的结构变量必须超越那些短期的、局部性的变量(Andersson & Palacio, 2017)。同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关于历史、地理和自然对增长的影响，有相互矛盾的证据和解释”，于是在选择国家社会能力结构变量时，尽可能排除这些因素，从而避免了解释的泛化。由此可见，Andersson & Palacio (2017)是把任何一个正常运行和良性发展的社会所必备的共性条件抽象出来定义为社会能力的结构变量；在Abramovitz(1995)强调的“利用现代技术的能力”和“人们的基本社会态度和政治制度”两个社会能力的关键支点中，其选择的结构变量更倾向于后者。

笔者认为，Andersson & Palacio(2017)把社会能力理论嵌入到增长韧性分析，塑造了一个对增长韧性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论证主要的社会能力结构变量对长期持续增长的深远影响，这无疑为那些陷入增长停滞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思路。但是，这并非是一个成熟的分析框架，尤其以正处于增长赶超的国家为研究对象时，Andersson & Palacio(2017)的理论缺陷就显得更为突出。在结构变量选择中，根本性的不足在于没有体现技术进步因素的关键作用；这不仅与经验事实大相径庭，而且也大大弱化了社会能力框架对增长韧性的理论解释力。早在2005年，世界工业发展报告(UNIDO, 2005)就指出，全球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非洲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收入水平差异近60%，可归因于知识存量的差异[[57]](#footnote-57)。纵观经济史，生产和传播技术的能力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实现赶超和维持持续增长的基础，由于学习的累积性，技术能力积累率的差异具有一种内在的趋势，即转化为各国经济繁荣的差距，缩小这些差距需要各种持续的追赶努力，关键是技术能力的迅速积累。国内知识的产生和积累，不仅是追赶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抵御增长萎缩的重要因素。Andersson & Palacio(2017)一方面看到“发展中国家对萎缩的韧性增加了追赶的持续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进程相对较快，因此在短期内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投资可能被认为不太重要，而劳动节约型技术一直是工业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来源”，因此，发展中国家赶超“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依靠同一套能力禀赋”[[58]](#footnote-58)，从而技术进步关键性没有在社会能力的结构变量体现出来。其实，这一观点与东亚地区的发展经验也是相悖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增长多萎缩少，其经济发展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增长韧性的不断加强，而技术能力的积累，一直是这些国家或地区摆脱长期增长陷阱的关键[[59]](#footnote-59)。Andersson & Palacio(2017)的社会能力结构变量框架，更多表达的是不同国家在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中一般的共性社会结构性特征，这些固然重要，但没有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社会不可能摆脱停滞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60]](#footnote-60)。作为发展的基石，技术进步应当是社会能力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变量。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持续创新和由此引致的技术进步，无疑是抵御增长萎缩、增强经济复原能力的重要支点。

然而，Andersson & Palacio(2017)把社会能力引入增长韧性分析，仍然为长期增长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贡献。社会能力是持久性国家特征的集中性体现，各国收入的相对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为持久性的国家特征所决定，因此，把社会能力从赶超的社会因素融入到长期增长韧性基础的分析，是与历史和理论逻辑相一致的。进一步看，从冲击和萎缩中能够实现增长复原，无疑取决于国家内生的有利于增长的社会因素的积累。社会能力作为“坚韧的社会特质”，有效地促进其积累而不将其削弱，事实上也是评价任何制度变革成功与否的基准和底线。

五、结论与启示

经济学家关于“增长率为什么不同”命题的大多数研究，大都是基于增长要素和增长机制的分析，这势必忽略对发展过程中的增长逆转因素及其影响因素，正如Broadberry & Wallis(2017)指出的，“在一个具有生产函数、强调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很难想象一个经济体如何在数年内以每年5%或10%的速度萎缩”[[61]](#footnote-61)。把增长萎缩排除在长期增长绩效的决定因素之外，无法解释各国赶超进程中差距持续扩大的直接成因。学术界对增长萎缩的研究，有助于推进人们对长期增长过程和决定因素的理解；在当下，以上讨论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作用。

其一，历史上大规模流行的社会经济后果以及目前疫情造成的全球冲击，凸显了增长与萎缩交替差异对长期发展过程的深刻影响。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效应提示我们，必须要关注萎缩强度对长期增长产生的负效应。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分享持续增长的好处，从而忽略了“增长逆转”的可能性，忽略全球增长率平均化过程中隐含的增长萎缩，疫情的持续冲击，再次提醒人们增长萎缩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要看到与人口、产业和技术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疫情冲击导致的经济萎缩具有更复杂的作用机制，而积极应对萎缩，将产生积极的长期增长效应。在疫情全球肆虐情况下各国为抑制经济萎缩的努力，对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其二，对增长萎缩的经济史实梳理表明，增长萎缩对长期增长绩效的效应是一客观存在，经济理论上不应缺失对增长萎缩的分析。理解经济发展应考虑到经济萎缩的作用：经济萎缩构成长期增长绩效的重要变量，长期经济绩效不过是增长和萎缩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国家要置身于长期停滞之外，抑制增长萎缩对长期的冲击是可行的路径，尤其要关注萎缩强度对长期增长产生的负效应，抑制萎缩是走出长期增长停滞的关键一步。在增长分析中考虑萎缩的作用的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于提示我们：一切减少或者抑制萎缩的努力，都会产生积极的长期发展效果。

其三，社会能力作为国家长期赶超的社会基础的理论价值，已经得到很多经济史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证和认可[[62]](#footnote-62)。社会能力理论嵌入到增长韧性分析，是一重要的理论创新，解释了增长韧性的社会经济基础问题。社会能力的嵌入，不仅推进了国家赶超理论，使增长韧性分析摆脱了“单一制度决定论”的束缚，而且进一步完善了对增长韧性方面国家间差异的理论解释，为不同国家如何抑制萎缩、走出停滞和维持长期增长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分析框架。但是这一框架仍然只是重要的理论尝试，Abramovitz(1986, 1995)强调的技术一致性和社会能力两者共同决定了国家赶超的观点，为进一步改进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重要的是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变量融入结构变量之中。

其四，增长萎缩与增长韧性研究对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经济是全球近40多年来稳定增长的典型；中国经济体现出来的增长韧性，表明我们的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是成功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增长萎缩冲击的影响和进一步塑造增长韧性问题。作为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我国各地区抵御冲击的能力和恢复增长或达到新的可能平衡的能力，势必影响并制约国家整体的增长韧性。事实上，我国各地区受到外部冲击以后恢复程度不同，重归增长轨迹的速度也有很大不同，而地区之间增长韧性的异质性，正是这种差别产生的根源所在。因此，实现中国长期稳定的持续增长，不仅要从国家层面抑制增长萎缩的负面作用，更关键的推进增长韧性的积累机制的建设。

最后应该看到，尽管把社会能力嵌入到增长韧性分析框架，为人们从“坚韧的社会特质”发现支撑增长韧性的那些结构变量提供了思路，但这并非是一个过程的结束；仍然需要人们从成功或者失败的发展经验中去挖掘有价值的要素到分析框架之中。中国和其他经济体重要的发展经验的总结概括，或许对此将颇有裨益，这一切有助于我们发展出一个更有效的、更明确的社会能力建设模式，以更清晰的路径来增强我们对经济萎缩的抵御和对复原能力问题的理解。

参考文献：

阿瑟•刘易斯，2009：《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

亚当•斯密，2002:《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商务印书馆。

彼罗•斯拉法，201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商务印书馆。

丹尼•罗德里克，2014：《经济增长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比较》第4期。

丹尼•罗德里克，2016：《过早去工业化》，《比较》第1期。

丹尼•罗德里克，2016：《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中信出版社。

李根，2016：《经济赶超的熊彼特分析：知识、路径创新和中等收入陷阱》，清华大学出版社。

马尔萨斯，1961：《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

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O•盖勒，2017：《统一增长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谢丹阳，周泽茜，2019：《经济增长理论的变迁与未来：生产函数演变的视角》，《经济评论》，第3期。

W.W.罗斯托，2016：《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浙江大学出版社。

沃尔特•罗斯托，2001：《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99：《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

约瑟夫•熊彼特，2009：《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

威廉•伊斯特利，2005：《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中信出版社。

杨先明，邵素军，2021：《国家赶超的社会能力：学说史考察》，《经济思想史学刊》创刊号。

Abramovitz, M. (1986), “Catching-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6(2):385–406.

Abramovitz, M. (1995), “The elements of social capability”, in: Koo, B. & D. Perkins (eds), *Social Capability and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MACMILLAN Press.

Acemoglu, D. et al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1231-1294.

Andersson, J. & M. Andersson (2019), “Beyond Miracle and Malaise. Social Capability in Côte d’Ivoire and Senegal during the Development Era 1930–1980”. Lund Papers in Economic History, No. 202.

Andersson, M. & A. Palacio (2017), “Catch up growth and social capab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onceptual and measurement proposal”, OASIS. 26:7-23.

Andersson, M. (2018), “Resilience to economic shrinking: A social capability approach to processes of catching up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1951-2016”, Lund Papers in Economic History, No. 183.

Andersson, M. et al (2021), “Resilience to economic shrinking in an emerging economy: The role of social capabilities in Indonesia, 1950–2015”,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17(3):509-526.

Barro, R. et al (2020), “The Coronavirus and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 Lessons from the “Spanish Flu” for the Coronavirus’s potential effects on mortality and economic activit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866.

Berg, A. & J. Ostry (2017), “Inequality and unsustainable growth: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IMF Economic Review* 65(4): 792-815.

Besedes, T. & J. Blyde (2010), “What drives export survival? An analysis of export duration in Latin America”,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mimeo 1:1-43

Besley, T. & T. Persson (2013), “Taxation and development”,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9307.

Bluhm, R. et al (2016), “The dynamics of stagnation: A panel analysis of the onset and continuation of stagnation”, *Macroeconomic Dynamics* 20(8):2010–2045.

Brautigam, D. et al (2008), *Taxation and State-build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pacity and Con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adberry, S. et al (2015), *British Business Cycles, 1270-18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adberry, S. & J. Wallis (2017), “Growing, shrinking and long run economic performanc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GE Online Working Paper, No. 323.

Cerra, V. & S. Saxena (2008), “Growth dynamics: The myth of economic recove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 (1):439-457.

Clark, G. (2007),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asterly, W. et al (1993), “Good policy or good luck? Country growth performance and temporary shock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2(3):459-483.

Fagerberg, J. & M, Srholec (2017), “Capabilit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41(3):905–926.

Fukuyama, F. (2013), “What is governanc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 314.

Galor, O. (2004), “From stagnation to growth: Unified growth theory”, Minerva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No. 2004-1.

Gerschenkron, 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iannakis, E. & A. Bruggeman (2017),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 resilience to economic crisis: A European perspective”.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5(8):1394–1415.

Hausmann, R. et al (2005), “Growth acceler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0(4): 303-329.

Hausmann, R. et al (2013), *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Mapping paths to prosperity. 2nd ed*., MIT Press.

Jerzmanowski, M. (2006), “Empirics of hills, plateaus, mountains and plains: A Markov-Switching approach to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1(2): 357–385.

Jones, F. & A. Olken (2008), “The anatomy of start-stop growth”.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0(3):582-587.

Jordà, Ò. et al (2020), “Longer-run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andemics”,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14543.

Kahn, Z. (2005),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vention: Patents and Copyrights in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1790-19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nder, A. et al (2013), *Power to the People: Energy in Europe over the Last Five Centur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ddison, A. (1991), *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Long Run Comparative Vie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R. (2010), “Roepke lecture in economic geography–Rethinking regional path dependence: Beyond lock-in to evolution”. *Economic Geography* 86(1):1–27.

North,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W.W. Nortorn & Company Press.

Ohkawa, K. & Rosovsky, H. (1973),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Ostry, J. et al (2015), “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No. 14/02.

Pamuk, S. (2007),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across Europe,1300–1600”,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1(3): 289–317.

Pinker, S. (2011),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Penguin Press.

Pritchett, L. (2000), “Understand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growth: searching for hills among plateaus, mountains, and plain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4(2):221–250.

Pritchett, L. & E. Werker (2012), “Developing the guts of a GUT (Grand Unified Theory): Elite commitment and inclusive growth,” Effective States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ESID) Working Paper, No. 16.

Putterman, L. (2013), “Institutions, social cap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Systems* 37(3):345-353.

Raddatz, C. (2007), “Are external shocks responsible for the instability of output in low-income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4(1):155–187.

Ricciuti, R. et al (2019), “How do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ffect fiscal capacity? Explaining taxation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15(2): 351-380.

Rodrik, D. (1999), “Where did all the growth go? External shocks, social conflict, and growth collaps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4(4):85-412.

Robbins, L. (1930), “On a certain ambiguity in the conception of stationary equilibrium”, *Economic journal* 40(158):194-214.

Stiglitz, J. (2005), “The ethical economist: Growth may be everything, but it’s not the only thing”, *Foreign Affairs* 84(6):128-134.

UNIDO (2005),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Capability building for catching-up, Historical, empirical and policy dimensions”.

1. \* 杨先明、邵素军，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650091，电子邮箱：xmyang1953@163.com；25836338@qq.com。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准技术前沿的我国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与制度保证研究”(19BJL014)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footnote-ref-1)
2. Jordà, Ò. et al (2020), “Longer-run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andemics”,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14543. [↑](#footnote-ref-2)
3. Barro, R. et al (2020), “The Coronavirus and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 Lessons from the “Spanish Flu” for the Coronavirus’s potential effects on mortality and economic activit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866. [↑](#footnote-ref-3)
4. 同上。 [↑](#footnote-ref-4)
5. Kander et al (2013)关于1000-1800年欧洲人口的统计，Kander, A. et al (2013), *Power to the People: Energy in Europe over the Last Five Centur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otnote-ref-5)
6. “国家特定的特点”这一概念可参见O.盖勒:《统一增长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8-182页。 [↑](#footnote-ref-6)
7. Hausmann et al (2005)，Jones & Olken (2008)的论述。Hausmann, R. et al (2005), “Growth acceler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0(4): 303-329. Jones, F. & A. Olken (2008), “The anatomy of start-stop growth”.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0(3):582-587. [↑](#footnote-ref-7)
8. O.盖勒：《统一增长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罗德里克：《经济增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比较》2014年第4期，第28-67页。 [↑](#footnote-ref-8)
9. Stiglitz, J. (2005), “The ethical economist: Growth may be everything, but it’s not the only thing”, *Foreign Affairs* 84(6):128-134. [↑](#footnote-ref-9)
10. Andersson, M. et al (2021), “Resilience to economic shrinking in an emerging economy: The role of social capabilities in Indonesia, 1950–2015”,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17(3):509-526. [↑](#footnote-ref-10)
11. Robbins, L. (1930), “On a certain ambiguity in the conception of stationary equilibrium”, *Economic journal* 40(158):194-214. [↑](#footnote-ref-11)
12. Broadberry, S. & J. Wallis (2017), “Growing, shrinking and long run economic performanc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GE Online Working Paper, No. 323. [↑](#footnote-ref-12)
13. O.盖勒：《统一增长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footnote-ref-13)
14. Broadberry & Wallis(2017)认为：长期经济表现可以用50年或更长时间内人均GDP的变化率来衡量。这一时期的经济表现是以年度水平衡量的短期变化的总和。参见Broadberry, S. & J. Wallis (2017), “Growing, shrinking and long run economic performanc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GE Online Working Paper, No. 323. [↑](#footnote-ref-14)
15. 本文对相关概念定义如下：萎缩是与增长相对应的一个变量；衰退是指经济向下变化的趋势，而停滞是指经济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 [↑](#footnote-ref-15)
16.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页。 [↑](#footnote-ref-16)
17. 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footnote-ref-17)
18.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69页。 [↑](#footnote-ref-18)
19.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75页。 [↑](#footnote-ref-19)
20.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footnote-ref-20)
21. 谢丹阳，周泽茜：《经济增长理论的变迁与未来：生产函数演变的视角》，《经济评论》，2019年第3期，第30-39页。 [↑](#footnote-ref-21)
22. Broadberry, S. & J. Wallis (2017), “Growing, shrinking and long run economic performanc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GE Online Working Paper, No. 323. [↑](#footnote-ref-22)
23.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 [↑](#footnote-ref-23)
24. North,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W.W. Nortorn & Company Press, p.59. [↑](#footnote-ref-24)
25. Acemoglu, D. et al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1231-1294. [↑](#footnote-ref-25)
26. O.盖勒：《统一增长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5页。 [↑](#footnote-ref-26)
27. Maddison, A. (1991), *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Long Run Comparative Vie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otnote-ref-27)
28.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55页。 [↑](#footnote-ref-28)
29. Andersson, M. et al (2021), “Resilience to economic shrinking in an emerging economy: The role of social capabilities in Indonesia, 1950–2015”,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17(3):509-526. [↑](#footnote-ref-29)
30.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70页。 [↑](#footnote-ref-30)
31. Broadberry, S. & J. Wallis (2017), “Growing, shrinking and long run economic performanc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GE Online Working Paper, No. 323, p.6. [↑](#footnote-ref-31)
32. Andersson, M. (2018), “Resilience to economic shrinking: A social capability approach to processes of catching up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1951-2016”, Lund Papers in Economic History, No. 183, p. 9. [↑](#footnote-ref-32)
33. Andersson, M. (2018), “Resilience to economic shrinking: A social capability approach to processes of catching up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1951-2016”, Lund Papers in Economic History, No. 183, p. 6. [↑](#footnote-ref-33)
34.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8页。 [↑](#footnote-ref-34)
35. 丹尼•罗德里克：《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footnote-ref-35)
36. 丹尼•罗德里克：《经济增长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比较》，2014年第4期，第42页。 [↑](#footnote-ref-36)
37. Easterly, W. et al (1993), “Good policy or good luck? Country growth performance and temporary shock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2(3):459-483, p. 21. [↑](#footnote-ref-37)
38. Clark, G. (2007),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amuk, S. (2007),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across Europe,1300–1600”,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1(3): 289–317.以及Broadberry, S. & J. Wallis (2017), “Growing, shrinking and long run economic performanc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GE Online Working Paper, No. 323. [↑](#footnote-ref-38)
39. Broadberry & Wallis(2017)认为在统一增长理论框架下，解释人口，产出与人均产出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已被证明是足够困难的，甚至无法从萎缩问题中抽象出来。 [↑](#footnote-ref-39)
40. Broadberry, S. et al (2015), *British Business Cycles, 1270-18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otnote-ref-40)
41. Broadberry, S. & J. Wallis (2017), “Growing, shrinking and long run economic performanc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GE Online Working Paper, No. 323, p.22-23.

    [↑](#footnote-ref-41)
42. Broadberry, S. & J. Wallis (2017), “Growing, shrinking and long run economic performanc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GE Online Working Paper, No. 323, p.26. [↑](#footnote-ref-42)
43. O.盖勒：《统一增长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169页。 [↑](#footnote-ref-43)
44. Andersson, M. et al (2021), “Resilience to economic shrinking in an emerging economy: The role of social capabilities in Indonesia, 1950–2015”,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17(3):509-526. [↑](#footnote-ref-44)
45. Easterly, W. et al (1993), “Good policy or good luck? Country growth performance and temporary shock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2(3):459-483, p. 21. [↑](#footnote-ref-45)
46.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8页。 [↑](#footnote-ref-46)
47. Rodrik, D. (1999), “Where did all the growth go? External shocks, social conflict, and growth collaps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4(4):85-412. [↑](#footnote-ref-47)
48. 威廉·伊斯特利.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footnote-ref-48)
49. Easterly, W. et al (1993), “Good policy or good luck? Country growth performance and temporary shock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2(3):459-483. 以及O.盖勒：《统一增长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78页。 [↑](#footnote-ref-49)
50. Fagerberg & Srholec (2017)认为，国家层面的能力，就是社会能力，参见：Fagerberg, J. & M, Srholec (2017), “Capabilit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41(3):905–926. [↑](#footnote-ref-50)
51. Abramovitz, M. (1986), “Catching-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6(2):385–406. [↑](#footnote-ref-51)
52. Putterman, L. (2013), “Institutions, social cap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Systems* 37(3):345-353, p.349. [↑](#footnote-ref-52)
53. Andersson, M. & A. Palacio (2017), “Catch up growth and social capab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onceptual and measurement proposal”, OASIS. 26, p.10. [↑](#footnote-ref-53)
54. Andersson, M. (2018), “Resilience to economic shrinking: A social capability approach to processes of catching up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1951-2016”, Lund Papers in Economic History, No. 183, p. 14. [↑](#footnote-ref-54)
55. Andersson, M. (2018), “Resilience to economic shrinking: A social capability approach to processes of catching up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1951-2016”, Lund Papers in Economic History, No. 183, p. 6. [↑](#footnote-ref-55)
56. Andersson, M. (2018), “Resilience to economic shrinking: A social capability approach to processes of catching up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1951-2016”, Lund Papers in Economic History, No. 183, p. 26. [↑](#footnote-ref-56)
57. 参见UNIDO (2005),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Capability building for catching-up, Historical, empirical and policy dimensions”. [↑](#footnote-ref-57)
58. Andersson, M. & A. Palacio (2017), “Catch up growth and social capab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onceptual and measurement proposal”, OASIS. 26, p.10. [↑](#footnote-ref-58)
59. 参见李根：《经济赶超的熊彼特分析：知识、路径创新和中等收入陷阱》，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footnote-ref-59)
60. 应当指出，Andersson(2018)的框架一定程度上偏离Abramovitz(1995)社会能力“利用现代技术的能力”以及“人们的基本社会态度和政治制度”的双重结构思想，这与Andersson(2018)把社会能力等同于社会资本理论相关，参见其“抵御经济萎缩的能力：1951-2016年发展中国家追赶进程的社会能力方法(Resilience to Economic Shrinking: A Social Capability Approach to Processes of Catching up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1951-2016)”一文的观点。 [↑](#footnote-ref-60)
61. Broadberry, S. & J. Wallis (2017), “Growing, shrinking and long run economic performanc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GE Online Working Paper, No. 323, p.13. [↑](#footnote-ref-61)
62. 杨先明、邵素军：《国家赶超的社会能力：学说史考察》，《经济思想史学刊》创刊号，2021年第一期，第124-144页。 [↑](#footnote-ref-62)